

儒法斗争史讲稿

天津站批林批孔理论小组

(供内部学习)

一九七四年七月

國法斗争史講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春秋战国、秦时期

王伯谦 薛清泉 苏航英

同志们：

目前我们车站广大干部和职工，正在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央〔1974〕12号文件指出：“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人民日报》社论还指出：

“不批孔，批林就不能彻底，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站党委号召我们要发扬打“持久战”、“攻坚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我们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把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解放前，历史这门学问长期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里，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变着法地往自己脸上贴金，混淆是非，篡改历史。孔老二是这样，他的忠实信徒林彪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这块上层建筑领域的阵地，我们一定要占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把被反动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导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深入。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对我们深入批林批孔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在我们几人讲一下儒法斗争史，我先说一下春秋战国和秦朝这一段。

春秋战国就是指的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221年，离现在有两千多年了。这一段前后共约500年。前半段叫春秋，当时鲁国有一本史书叫《春秋》，记的就是这一段的事。后半段，因为各诸侯混战，所以叫战国。春秋战国这个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当时奴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兴起，真是“天下大乱”。大家知道，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压迫是非常残酷的，那个苦劲比我们在旧社会受的苦还厉害。在奴隶主眼里，奴隶纯粹是会说话的牲畜，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劳动时还要带着枷锁。他们的劳动成果完全被奴隶主占有。奴隶主对奴隶可以随便打骂、买卖和杀害。当时四个奴隶加上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奴隶主死了要用几十个、几百个奴隶为他殉葬。那个时候也有一套制度。一为“分封制”，奴隶主贵族最大的头子叫“天子”，把土地和奴隶分给他的儿子或亲属、臣下。二为“等级制”，就是把人们划分为等级，最高的是“天子”，下边是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就是咱们常说的“三六九等”。他们按等级分土地、奴隶，大有大份，小有小份。三为“世袭制”，就是保证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的特权世代相传。奴隶主想这样就可以永远地剥削、统治奴隶。

但是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时经常发生奴隶暴动。鲁国出了一个叫柳下跖的，率领九千名奴隶造了反，所到之处，奴隶主贵族望风逃窜，震动很大。在生产上，出现了铁器，出现了私田。私田实行租佃制，佃农劳动除了交租外，还可以落点东西，这就比奴隶制优越了。结果私田越来越多，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逐步形成，这就是封建社会的萌芽。

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候，是坚持革新，还是主张复古，是坚持前进，还是主张倒退，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儒

家是一派，这就是孔老二、孟轲之流，他们狂叫“克己复礼”，提出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拚命地抱住奴隶制不放。儒家的对立面就是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少正卯、李悝、吴起、商鞅、荀况、韩非等。儒法斗争的焦点主要有四方面：

第一是复“井田”还是废“井田”。“井田制”是奴隶主计算土地数量和剥削奴隶的一种方式。把地划成井字形的九块，奴隶主派小头目在中间监督奴隶劳动。孔老二等坚决主张恢复这种制度。法家就坚决反对。

第二是“礼治”还是“法治”。“礼”的内容很广泛，它是规定奴隶主和奴隶的尊卑、上下关系的。要害就是刚才说的“分封”、“等级”、“世袭”制，孔老二等要复的就是这个“礼”。法家主张实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来代替奴隶主的礼治。

第三是“奉天命”还是“反天命”。儒家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智下愚”等，为奴隶主阶级统治制造舆论。法家宣扬“人定胜天”，认为“智”“愚”是后天努力不同的结果，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

第四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分封制搞诸侯割据，各自为政，必然四分五裂。而郡县制主张中央集权，各郡县大官由中央统一调派，这就避免了诸侯割据和混战局面的重演，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文化都有极大好处。法家主张郡县制，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这四个问题上，战国末期，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秦始皇坚决支持并采纳法家的政治主张和建议，因此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全中国。秦始皇所以能统一天下，主要是因为他尊法反儒，厚今薄古，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有一条坚持革新、坚持统一、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以及在这条

政治路线指导下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在秦始皇历史作用评价上，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和尊孔派把秦始皇说得百嘛不是，什么暴君呀！千古罪人啊！在秦始皇身上造了好多谣，说了好多坏话，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借咒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对秦始皇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不仅是史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主要是：

第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结束了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天下。在西周，文王、武王统治的时代，实际上有八百个诸侯。到了战国时代归并为七国，这是一个大的进步。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情。他改革了政治制度，实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这里讲一下“图穷匕首见”荆轲刺秦王的问题。“图穷匕首见”这个典故，出自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个故事把荆轲吹得神乎其神，说他是“英雄”，是“壮士”，其实他是儒家之徒。荆轲到底是英雄还是个小丑？对他刺秦王究竟应该怎么看？我们应该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 227 年的战国末期，当时七国争雄，秦王借助于人民的力量，顺乎时代的潮流，灭了韩、赵二国后，直捣燕国。燕国虽然也进入封建社会，但是改革不彻底，奴隶主贵族势力还很不小，燕太子丹就是没落的奴隶主头子。就在秦兵压境之时，燕太子丹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利益，反对统一

中国，阻挡历史前进，就想借暗害秦王来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那末，怎么暗杀秦王呢？燕太子丹找了一个亡命徒，这就是荆轲。荆轲还找了个助手叫秦舞阳的。正好秦王有个叛将叫樊于期的投降了燕国，燕太子把他杀了，让荆轲带着他的脑袋，拿着燕国的军事地图，并在图内裹着一把匕首，献给秦王，以此伪装“归顺”，伺机刺杀秦王。荆轲到了秦国后，秦王在咸阳宫隆重设宴接待。荆轲献上了樊于期的脑袋和地图，秦王展开地图时，最后露出了匕首，荆轲随即抢过匕首向秦王刺去，但没有刺中，守卫在大殿下边的卫士赶上来杀了荆轲这个可耻小丑。不久秦军攻破燕都蓟，灭了燕国。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

我们从这个历史事件中，联想现实阶级斗争，可以告诉我们，那种搞阴谋诡计，搞暗杀的卑鄙手段的人，是由他们没落阶级的阶级本性及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燕太子丹导演了“荆轲刺秦王”这出丑剧，既挽救不了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灭亡，也阻止不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胜利，而只能以荆轲“一去兮不复还”而告终。卖国贼林彪搞倒退、复辟，也学燕太子这一手，极力网罗荆轲式的反革命小丑，用“不成功便成仁”和日本法西斯“江田岛精神”为其喽罗们打气。妄想“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复辟资本主义。结果机毁人亡，粉身碎骨，独往而不独来了。

第二，坚持革新，尊法反儒，反对倒退，反对复古复旧。这里讲一下“焚书坑儒”的事情。两千多年来，这是历代反动阶级用来咒骂秦始皇残暴的所谓根据。“焚书坑儒”事件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们有必要把它弄清楚。

秦始皇掌握政权后，采取了两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反儒步骤。一个是铲除了以吕不韦为首的反动奴隶主集团；另一个就是在统一中国以后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当时儒

法两家的斗争非常激烈，反动儒家代表淳于越要秦始皇恢复奴隶制的分封，把土地分给子弟、功臣。秦始皇把这个问题交大臣们讨论。这时法家代表李斯批驳了儒家复古倒退的谬论，同时建议秦始皇说：现在天下刚统一，政权刚稳定，老百姓正努力生产，可是这些反动儒生宣扬复古倒退，惑乱人心，搞阴谋活动，应该严厉镇压。秦始皇采取了法家建议，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了地主阶级专政，烧掉儒家的经书，但药书、农书和其他书籍没烧。并规定谁再读儒家的书，或借古讽今就杀头。

第二年，反动儒生们不甘心失败，继续煽风点火，借烧书的事，大造反革命舆论，鼓吹今不如昔。秦始皇对此采取坚决措施，把罪大恶极、专门搞阴谋诡计的儒生在咸阳埋了四百六十名，这个革命措施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

从以上问题来看，秦始皇这样做是必要的，不这样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

但是，历史上的反动家伙们和我们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抓住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点，狂叫什么“残忍”哪！“暴政”哪！以此来反对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毛主席提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当时就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随即遭到毛主席的严厉批驳。毛主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查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夠，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毛主席这段话是对林彪攻击秦始皇的最有力

的批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奴隶主贵族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对待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诡计，搞复辟倒退的极右分子就是要镇压。实行专政，这也是从反动阶级那里学来的。总的看来，儒家对奴隶、对农民、对群众是残酷镇压的。儒家比起法家来，杀人要多。当初，孔老二杀少正卯陈尸三天；楚国奴隶主贵族射死法家吴起，剁成肉泥；秦国的奴隶主贵族把商鞅五车分尸，全家也被杀害。直到杀人不眨眼的蒋介石，他们屠杀劳动人民、进步人士非常残忍，蒋介石也是一个大儒。今天，我们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搞破坏。象野心家林彪就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还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这说明我们做对了，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它看做是护身的法宝，不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敌人彻底干净地消灭，我们绝不放弃它。

第三，在抵御外来侵略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抵御匈奴侵犯，在边疆原有城墙的基础上修起了长城。这是一个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从历史上看，所有尊法反儒的人都是爱国的。秦始皇在保卫封建统一国家上是有功绩的。这里讲一下孟姜女哭长城的问题。反动派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近台湾蒋介石为尊孔反法大演孟姜女哭长城的戏剧。叛徒、卖国贼林彪于1960年5月也跑到孟姜女庙行礼朝拜。究竟是什么呢？孟姜女哭长城是不是真实的呢？今天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早在秦朝之前，春秋战国时期，曾经记载齐国有个叫杞梁的人，在攻打莒国（今山东境内）时战死。齐侯回来告诉他的妻子，杞梁妻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十分悲痛，痛哭流涕，传说把城墙

哭塌了一块。以后传来传去，到唐朝就传成孟姜女哭长城了。万里长城怎么能哭倒呢？这是十分荒唐的。反动派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呢？说穿了，就是孔孟门徒为了攻击秦始皇，有意给秦始皇抹黑，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第四，统一度量衡、文字、车辙的宽度等，促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秦统一六国前，各国的度量衡在长短、大小、轻重和进位等方面都是不统一的。以后秦始皇下令把商鞅所造的标准度量衡器，加刻诏书公布，统一了度量衡。原先各国之间，在文字写法上也不一样。秦始皇命令李斯等人用小篆编写文字课本，作为标准文字，又把小篆的拐弯抹角的笔划改为直线笔划，便于写字，这就是隶书，做为日用文字在全国推广。秦始皇还修筑了通往四方的大道，统一了车辙的宽度。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秦始皇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代表，是个封建帝王，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必然要遭到农民的反抗。在他死后不久，秦朝就灭亡了。

列宁教导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做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确实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统一的进步作用，这点必须肯定。也正因为这点，那些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妄图阻挠历史前进的孔孟之徒，拚命咒骂秦始皇。联系第十次路线斗争，叛徒、卖国贼林彪肆意歪曲历史，攻击秦始皇，正好暴露了他们一伙反对革命，坚持复辟，反对前进，坚持倒退，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暴露了他们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

两汉、三国时期

田致顺 杜玉书 倪宝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西汉（公元前206年）至隋（公元618年）共经历了十一个朝代，在这824年的历史过程中，地主阶级，开始由一个进步的阶级，逐步转化成保守、反动。反映在政治思想上，也开始由尊法反儒逐步转变成尊儒反法。在汉初，从汉高祖刘邦起，经过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一百多年，基本上还是奉行的法家路线和政策。汉高祖刘邦不信儒，不见儒生，甚至拿儒生的帽子撒尿。刘邦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汉王朝仍然不重用儒生。汉武帝名义上尊儒，实际上不是尊儒，而是崇法。直到汉宣帝时，儒家也还是不十分吃香的。到汉元帝的时候，才真正推行尊儒反法的政策。

为什么当时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转变成尊儒反法呢？这是因为：

一、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变了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汉元帝

以后，西汉的封建统治阶级，就由原来代表革新力量的先进阶级，变成了代表保守力量的反动阶级。它们要极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必然要利用反动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二、社会矛盾变了

在奴隶社会后期，主要矛盾是奴隶主和奴隶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在奴隶主被推翻以后，地主阶级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奴隶也逐步转变成为农民。这样，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儒家的反动理论，也就成了地主阶级压迫和奴役农民的思想工具。

三、儒法两家代表的阶级变了，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变了

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是被压迫阶级，它反对奴隶主阶级，主张变革、主张前进。可是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取得了统治权以后，就不再要求社会变革，而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儒家已不是原来的儒家，法家也不是原来的法家。这时的法家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和部分地反映了农民的要求，他们受儒家的迫害和镇压，为了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常常是以儒家的面目出现，宣扬法家思想，同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进行斗争。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法家王充和儒家董仲舒的斗争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是西汉时孔孟的忠实信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景帝时曾作博士官。武帝即位后，他又出谋献策，对武帝说：现在各家的学说到

处流传，这样下去很不利于封建统治。要在思想上实现统一，必须禁止其它学派的活动。并且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起了尊儒反法的黑旗。

董仲舒的反动著作《春秋繁露》发挥了孔孟之道的“天命论”，宣扬“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说，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为了把封建秩序固定下来，又引用了孔老二的“正名”学说，把封建伦理道德发展为“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把这些都说成是天安排的，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董仲舒的“三纲”是欺骗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毛主席说：“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董仲舒还发挥了孔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提出所谓的“性三品”，就是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筭之性”。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中等的“中民之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学习渐渐变为善的；劳动人民的“斗筭之性”天生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他的“性三品”实际就是孔老二的“上智下愚”。以此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是绝对“合理”的，是不可改变的，借以欺骗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

董仲舒的“靠天命”就是孔老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翻版。这统统是胡说八道。我们劳动人民从斗争中懂得了一条道理：没有天命，只有革命。解放前，劳动人民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咱们装卸工挨打受骂，受苦受难，封建把头叫我们“臭苦力”“装卸夫”，胡说“这是命里注定”的，来欺骗我们，不叫我们起来造反。解放后，我们工人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生活上有了保障。有的老工人入了党，有的还进驻大学登上了上层建筑的历史舞

台，难道这一切都是“天”会可怜我们吗？不，决不是。而是因为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革命，推翻了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叛徒、卖国贼林彪贩卖“天命观”和“天命论”统统是骗人的鬼话。

由于董仲舒维护反动的孔孟之道有功，就挤进了孔家店群丑的行列，被捧为“百儒之首”，“七十三贤”，这样的反动家伙，林彪却把他奉若神明，这就清楚地表明：林彪和董仲舒一样，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和董仲舒的儒家思想针锋相对的王充，是位杰出的法家代表。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县人，出身于从事过农业和商业的平民家庭，和下层的人民有过接触，又受过世家大官僚的压迫和凌辱，所以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同情感。他是我国古代批判孔孟儒家的进步思想家。东汉最高统治者为了宣扬孔孟之道，于公元79年在京城的白虎观召开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董仲舒的反动思想，并且把孔老二抬得更高，成了任何人都不能触犯的神灵。在这种情况下，王充勇敢地公开打出了批孔的旗帜，不但狠批董仲舒的反动谬论，而且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孔老二，以“问孔”“刺孟”的战斗姿态，尖锐地斥责孔孟之道，揭穿他们违背客观事实，宣扬唯心主义的罪恶目的，充分表现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他明确指出：孔老二的話“上下多相违”，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公开提出：“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留下的《论衡》一书，就是一部伐孔刺孟的战斗檄文。

王充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天”与“人”的关系，对董仲舒宣扬的“天人感应”、“天命观”、“天才论”等反动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董仲舒认为天是能赏善罚恶的上帝，天任命君主来统治人民，而人民要服从天就必须服

从封建君主的统治。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天是自然界，不是神。天没有口和眼，自然就没有感觉欲望，没有意志，也不是什么上帝。王充说：万物的生长、成熟，是世界上的自然现象。天地没有手，哪能制造出千千万万的东西呢？他指出：董仲舒之流说天地有目的来生人，这是荒谬的。

王充还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天才论”。王充认为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明确指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就是说，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的知识不是学来的，人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所谓先知先觉天生的“圣人”是不存在的。王充还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十六件事，生动地揭露了所谓“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都是骗人的把戏。不管什么样的圣人，如果没有耳闻目见的感觉，对于外界事物，也是什么也不能知道的。林彪和董仲舒一样。他以反动的“天才论”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标榜自己是“天才”，天生就比别人强，而把劳动人民说成是只知道油盐酱醋柴……的“下愚”

“小人”，这纯粹是胡言乱语。事实说明了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林彪美化自己，诬蔑人民群众，就是反对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结果这个自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天才”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二、法家代表桑弘羊与儒家代表 霍光及贤良、文学的斗争

桑弘羊是汉代一位著名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数十年，参与制订并积极贯彻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盐铁官营”就是其中的一项。

西汉中期，在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的第六年二月，

即公元前81年，围绕着盐铁等业的官营政策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

儒家代表人物霍光，是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他反对桑弘羊的主张，在这场斗争中做为幕后操纵者，没有出场，让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出场做为他的炮筒子，并选派了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搞突然袭击，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舌战群儒，把这些孔孟之徒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总结这场斗争经验，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批判林彪尊孔反法、分裂倒退、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

这场斗争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

（1）是搞分裂割据，还是维护国家统一？

在盐铁会议上，儒家门徒们叫嚷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原则，这样做“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的一大疾苦。同时还胡说“末盛而本亏”，这样做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看！他们振振有词，把自己打扮成要义不要利的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从表面上看，攻击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怀有险恶的政治用心。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打掉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制的物质基础，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其实，他们的这些话都是从孔老二那里抄来的，什么是“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就是孔老二宣扬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翻版。

难道他们真的不要利了吗？这完全是天大谎言。孔老二在陈蔡被围，饿扁了肚子的时候，学生弄来了酒肉，孔老二不容分说，抢过猪肉就啃，端起酒就灌。他口头上反对搞商

业，但周游列国的经费却要靠当大商人的学生子贡掏腰包，而且越多越好。汉代的那些儒生，没有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升官发财的，凡是有利可图的事，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他们并不是要义不要利的。

儒家们还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大讲老百姓买不起铁，买不起盐，穿破衣的寒，吃粗糠的苦，看来他们真的要为民谋福利了，其实也是一个骗局。他们反对盐铁官营，就是为了这些贵族们在各地称王称霸，各占一地任意的剥削农民。汉文帝时私人可以炼铁、煮盐、铸钱，结果吴王刘濞把持海滨，大官僚邓通霸占西山，他们使用大量的劳动力铸钱、晒盐大发横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私门成党”，大搞分裂活动。显然他们为之争利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这些大地主、诸侯、大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桑弘羊主张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正是为了打击这些反动势力。他痛斥儒家们说：先生们，依了你们得利的只能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势力，而国家就什么也干不成。你们的议论，专门是为了损害中央而为地方分裂势力服务的。这些话击中了儒家的要害。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国富民穷”，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这纯粹是睁眼说瞎话。就拿我们“六号门”来说吧！解放前，工人们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那时工人有三件宝：“勾子、垫皂、破棉袄”，“铺着地，盖着天，头上枕着半块砖，洗脸喝水用铁锨”，整天累死累活地干，把头只给几把杂合面，连一个人吃饭都不够，更别说是养活全家。可是当时的资本家和把头们也满嘴的“仁义道德”，他们家里供着“天地君亲师”的条幅，屋